

第十五章 十四與十五世紀的教會與國家

變遷中的文化和轉變中的價值

正如大部分過渡時代，十四與十五世紀激烈而動盪頻仍；這兩世紀裏，中古高峯文明根本價值的信心逐漸式微。繁榮變成間歇的經濟衰退、樂觀轉入幻滅，把物質與精神世界融合起來的十三世紀夢想也褪色了。社會行爲走上極端——反叛、縱慾、自苦、犬儒主義，以及巫術。在這兩個世紀，強力的創造力量仍在運作，但對很多觀察家來說，這些力量遠不及解體與衰敗的力量明顯。歐洲經濟、人口和疆界收縮，同時處處是悲觀與恐懼封閉的氣氛，而這氣氛又定期爆發成狂熱和盲動。這時期的文學和藝術常常給幻想、怪癖及死亡籠罩著。英國和法國受戰爭摧殘，兩者都被瘋子統治了一段時期。十四世紀中葉，黑死病流行，並定期復發，奪去百萬計的無辜性命，並困擾著生還者的心靈。

這些社會與心理失序的徵候，與西歐政治取向的轉移有關——由一個基督聯邦轉變為一羣據地自立的國家。羅馬天主教會在中世紀後期陷入逆境。西歐諸國遭受內外戰爭的折磨，有時，亦為瀕臨跨臺的皇家政府所苦。但是，在這時期的最後半世紀（約1450-1500），強而有力的君主在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出現；這三個國家注定在將來許多世紀裏控制西

歐政治。到一五〇〇年，君主取代教會，成爲人民的最高效忠對象。教皇在義大利的地方政治裏泥足深陷，而中古的基督教國際主義正在分裂。

中古後期的教會

中世紀晚期，基督教世界向民族國家演進。說這是轉化，不如說是重心的轉移。即使在中古高峯時期，由教皇和神職人員領導的基督教聯邦理念，也從未實現。教皇最多只能對皇帝取得暫時的政治勝利，並使皇室權威與神職權威達到不算安定的均衡狀態。至十三世紀後期，這均衡漸失，而有利於英國的愛德華一世與法國的英俊的非力普。這趨勢在中世紀後期變本加厲，至一五〇〇年，教皇的職權已弱到不能作爲國際力量，而君主則變得強而有力。「國家」，在任何嚴格的定義下，仍未出現，但教皇對各王國內部教會的權威已日漸薄弱。日耳曼的選帝諸侯 (Princely Electors) 長久以來已否定教皇在皇家選舉與加冕上的任何角色，教皇在法國、英國和西班牙高級教士委任上的影響力也已消退。更重要的是：中世紀後期，我們看到教皇的屬靈威望崩潰，而且基督徒的虔敬與教會組織之間的裂縫也加深了。

神秘主義者和改革者

基督教在這時期沒有明顯的沒落，只是變得不再那麼以教會爲主。強大的平信徒虔敬運動在整個中世紀高峯期裏都不斷離開教皇的領導，此時更逐漸敵視教會的財富與特權、愈來愈個人主義、以及偏向神秘。席捲中古後期歐洲的神秘主義波浪大部分都不是公開的異端；但，因爲強調個人與神

之間的靈性關係，神秘主義者傾向於貶低正式委任的教士，而且比較不認爲聖禮是獲得神寵的管道。神秘主義者相信聖餐的效用，但他們主要專心於直悟上帝。既主直悟，教士、教皇及聖禮皆無必要。

神秘主義素來就是基督徒虔誠生活裏的一個要素，在中世紀高峯期甚爲聞名。但，隨著教會內部的自滿與腐化，神秘主義首次成爲一種大規模的平信徒運動。早在十四世紀，偉大的道明派神秘主義者艾克哈特 (Meister Eckhart, 死於1327年) 就主張：人類真正的目標是與感官世界全然脫離，並溶入未知的神裏。艾克哈特有很多追隨者，一個世紀後，幾個大規模的神秘主義共同體成立了：一種組織鬆散、由平信徒構成，名叫「比金」(Beguines) 的團體在比利時與荷蘭流行起來，並傳播至日耳曼。這種團體，有性質類似的的神秘男女團體效法。

約一三七五年，極具影響力的「共同生活兄弟會」(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由艾克哈特一位門人的學生、世俗傳教士杰勒德·格羅 (Gerard Groot) 創立。「共同生活兄弟會」致力於簡單樸素的傳教、教書與慈善工作生活。他們在十五世紀的北歐流行，近似兩個世紀前的聖方濟修會，不過，兄弟會並不立終身之誓。它們的學校名列歐洲最優秀的學校，出產了十五與十六世紀一些傑出的神秘主義者、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者。伊拉斯莫思 (Erasmus) 和路德 (Luther) 都出身兄弟會學校。多瑪斯·甘必 (Thomas á Kempis, 死於1471) 亦然；他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是中古末葉神秘主義的最高文學表現。〔效法基督〕有典型的神秘主義看法，重崇拜而輕思考，重內在靈性的純潔而輕外在的「善行」，強調直接體驗上帝，而不重視以聖禮求取神恩。〔效法基督〕仍屬於正統天主教教義的範

疇，但其中有些觀念使十六世紀新教改革者大為嚮往。所有神秘主義者都強調個人的虔誠，因此，他們是把天主教視為個別靈魂的總集，每個靈魂各自尋求救贖。這種看法，損害了基督教是一大共和體的中世紀觀念。

基督教的個人主義成分有時候也演變成異端。牛津教授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 死於 1384) 比後來的新教徒更早一步把聖經的權威置於教皇與教會議會的文告之上。威克里夫把當代神秘主義的涵意拓展到極限，強調的個人內在的性靈旅程、質疑基督在聖餐中出現的真實性、貶低整個聖禮制度、並大聲指斥教會財富。聖方濟景仰使徒式貧窮，不過，他只是身體力行，而不強加於人。但是，有此一念，十三世紀的方濟運動就已經隱含威克里夫上述最後一項抗議了。後期方濟主義在財產的問題上妥協，因而激發一個狂熱的分離團體——「靈性派方濟會」——他們堅持全體教會應該守貧，因此，他們反教會、反教皇。一三二三年，乖巧的阿維農「財務教皇」約翰二十二世 (1316-1334) 宣佈使徒式守貧生活的教條是異端。半個世紀之後，威克里夫被褫奪教授職位，並被定為異端；因為他在法院中有頗具勢力的朋友，而且，在十四世紀的英國，教皇並不受歡迎，他才得以安然終老。但是，他的路勒派 (Lollards) 信徒就沒有這般幸運。由一四〇一年一條國會法案的標題「火燒異端法」，可見他們的命運。一五三〇年代，英國已不再有路勒派信徒來慶祝亨利八世與羅馬的決裂。

英國的路勒派代表著對正統教會漸增的不滿的極端表現。威克里夫的教義傳到遙遠的波希米亞，在那裏，由宗教改革者約翰胡斯 (John Hus) 發揚光大。胡斯的信徒以威克里夫的反教會主義為武器，爭取捷克脫離日耳曼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一四一五年的康斯坦宗教大會 (Council of Con-

stance)，胡斯被燒死在火刑柱上，但他的追隨者生存至宗教改革時代，成為全國性的分離團體。在對抗組織嚴密的國際教會方面，威克里夫和胡斯代表著個人宗教信仰與國家主權觀念的調和。若基督教信仰是個人的事情，那麼，教皇和高級教士的政治要求是無意義的，世俗統治者可以治理國家，而不受教會的干擾。因此，中古後期基督教的激進面——它的反教會主義——趨於支持逐漸增強的世俗主權觀念。具有熱烈宗教精神的人，如約翰胡斯，以及一四三一年被視為異端而燒死的聖女貞德，於是可以把基督教神秘主義和開始萌芽的愛國主義融合起來。

教皇和宗教會議

神秘主義和宗教改革者，暗地或公然，都反對教皇是神和基督信眾間的主要橋樑之說。中古後期的教皇本身也很容易遭受他們的抨擊。前面說過，十四世紀初，教皇遷徙到隆河 (Rhone River) 的阿維農：此地正在法國領土外緣。那裏，由一三〇九至一三七六年，有一系列英明的法國教皇。阿維農教廷只是有時順從法國的皇帝，大部分的時間，他們都能作出強硬和獨立的行動。但他們所處的地方，使法國的敵人認為他們不再是大公無私的國際力量。其間，也曾有幾次把教廷移回羅馬的嘗試，但計劃都被聖城強烈的黨派鬥爭所破壞。與此同時，阿維農的教皇把十三世紀的行政和財政效率帶到極致。阿維農教皇的龐大、組合良好的官僚結構，所提供的財力和人事，足以使教皇成為比以前更強大的國際勢力。但是，行政機器卻不能感召神秘主義者和改革派，而法國鄰邦亦不滿教皇向它們收稅及干預——他們誤以為教皇是法皇的工具。因此，當教皇越來越富有和更有效率時，其

靈魂上的資本卻在遞減。

最後，在一三七六年，教皇格列哥里十一世把羅馬教廷遷回羅馬。格列哥里不滿他在羅馬所遭遇的混亂狀況，打算搬回法國，但未實現，便於一三七八年逝世。紅衣主教——大部份是思鄉的法國人——受一羣羅馬暴民催促，勉強選出一位義大利人為教皇。這位新教皇，烏爾朋六世（Urban VI），是教會組織裏並無色彩的份子。現在，出人意外，他成為狂熱的宗教改革者，並開始實行某些措施，減低紅衣主教的收入和影響力。法國的紅衣主教逃離羅馬，以遭受暴徒脅迫為理由，取消先前的選舉，並推舉一位法國教皇，一同返回阿維農。烏爾朋六世返回羅馬，委任新的紅衣主教。而其後的三十七年，普世教會就分裂了。敵對的教皇逝世後，他們的紅衣主教又推選敵對的繼任人。羅馬的教皇和阿維農的教皇互相把對方逐出教會，而歐洲各邦則依照他們的利益來附從一方。法國及其盟國支持阿維農，英國與神聖羅馬帝國支持羅馬，義大利城邦則隨那一方切合其利益而游離於兩者之間。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但對於教皇長久以來的絕對屬靈權威，地上似乎沒有勢力可以在兩個敵對的教皇之間擔任仲裁。教會陷入死胡同。

大分裂延續下去，越來越多的基督徒相信：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召開一次全教會議。兩個教皇都說宗教大會低於他們，因而不能論斷他們；而基督徒也迷惑：除了教皇，到底誰有權威來召開宗教大會。最後，兩個陣營的一些紅衣主教召開一次宗教大會，聚集於比薩。一四〇九年，五百個高級教士在那裏廢掉兩個教皇，並推選一個新教皇。因為兩個教皇都不承認議會的罷免，比薩宗教大會的結果是使二重分裂轉化成三重分裂。這處境不只可恥，而且可笑。最後，神聖羅馬皇帝安排召集歐洲重要的教會要員參加康斯坦

宗教大會（1415-1418）。終於，在這裏，分裂局面得以結束。兩個教皇被罷黜，第三個則請辭，馬丁五世（Martin V, 1417-1431），被選為議會承認的教皇，教會因而才再統一。

對許多有思想的基督徒來說，只治癒分裂，是不夠的。教廷仍然不受信任。有人主張：將來的教皇應該受定期召開的而且自主的全教大會指揮。當代的世俗政府已經十分熟習議會與集會的角色。那麼，為什麼教會不能同樣「依據憲法」來運作管理？主張這類觀念的，十四世紀有帕度亞的馬西流（Marsilius of Padua），十五世紀有古沙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而且廣為康斯坦的高級教士所接受。從他們燒死約翰胡斯，可見這些代表本質上是保守的（皇帝向胡斯保證他安全來去，胡斯才與會）。但是，康斯坦的宗教大會作出真心的努力，想以議會的路線來改革教會體制。大會代表們不顧教皇的反對，主張在教條和改革的事情上，宗教大會是最高權威，他們並且裁定往後定期召開全教大會。

這些廣泛的原則與一系列的特殊改革在康斯坦宗教大會議決，受到教皇馬丁五世及其繼任人的強烈反對，他們堅持教皇有絕對權威。教皇被迫在一四二三和一四三一年召開宗教大會，但暗施手腳，使它們沒有效率。中古最後一個重要的宗教大會，巴塞爾全教大會（Council of Basel, 1431-1449），逐漸與頑固的教皇公開分裂，結束得毫無光彩。至此，歐洲對宗教大會的熱情冷卻了，宗教大會運動已死，而單一的教皇在沒有敵對的情形下再一次統治羅馬。

從巴塞爾的解體（1449）到宗教改革運動萌芽（1517）之間，坐在教皇位子上的人非常不同於他們中古高峯期的先輩。他們放棄了已往教皇對國際教會的大部份的裁決權，而

用心於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令人著迷的文化與艱苦的本地政治。現在，教皇多是義大利人，以後亦然。他們力圖加強掌握幾個教皇國，在義大利外交的流沙裏運用謀略，承認北部君主對教會與教士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權，換取他們正式承認，以及教皇與國王之間對教會收入的協定分配。

十五世紀在波吉亞（Borgia）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一四九二至一五〇三年）的任期裏結束。他斯文掃地的行為和私生子女，即使在文藝復興高峯時期的義大利，也令人瞠目吃驚。亞歷山大是中古末期教皇痼疾的傳神寫照。他致力促進自己家族的利益，全力支持其子凱撒（Caesar）肆無忌憚的軍事與外交活動。凱撒利用謀殺、背叛和武力，在義大利中部建立了一個巨大的波吉亞城邦。

這位波吉亞的教皇清楚顯示出：到一五〇〇年，教皇已不再是國際性的精神力量。亞歷山大六世死後十四年，新教改革運動爆發，路德的反叛受到普遍支持，說明了中古後期教皇的種種失敗。歐洲人並沒有預備就此拋棄基督教，但他們大多數都願意捨棄光彩盡失的羅馬。

西歐的君主政體國家

由國際天主教轉向世俗主權的中古後期趨勢，帕度亞的馬西流的重要論述〔和平保護者〕（*Defensor Pacis*, 1324）有強烈的表現。教會和世俗裁決權之間的衝突在這本書裏作了有利於國家的解決，毫不妥協。馬西流主張教會在政治上的權威應該剝掉，而國家應該對其子民，不論世俗或教會，運用無上的主權。由是，在信仰上統一的教會，在政治上應該瓜分成多個國家教會，它們忠於各國的世俗統治者，而非忠於教皇。在其對主權國家的歌頌裏，〔和平保護者〕預示

了中古後期與近代初期的政治進展。

但是，要到一四五〇年之後，西歐的君主才能一貫地肯定他們對貴族的權威。十四世紀初葉至十五世紀中葉這段時期，走向皇室中央集權制的中古高峯時期趨勢似乎逆轉過來。伊比利半島上的主要勢力——亞拉岡、卡斯底爾和葡萄牙——都被間歇性的內部動亂所困擾，對於削弱在這半島上所剩下的伊斯蘭領土——格蘭那達——沒有絲毫進展。英國和法國捲入百年戰爭（1337-1453）：迫使英國瀕臨破產邊緣，法國鄉間與人民則飽受摧殘。

英國

然而，英國的不成文憲法在這些年代有重大發展。十四世紀期間，國會由一間歇集會的組織轉變而成永久建制，而且分裂為上議院和下議院；下議院由城鎮居民和郡武士的代表組成，與因為百年戰爭的虛耗而狼狽不堪的君主談判。下議院用它在財政上的支持，來換取重要的政治讓步。到了世紀末，它獲得對所有風俗習慣沒有規定的稅收的批准與不批准權。控制了皇室荷包以後，下議院在立法上發揮日漸增強的影響力。下議院採用「先正後補」的箴言：國王未同意下議院的聲請以前，下議院拒絕在財政上資助國王。到最後，皇帝幾乎總是順從。

但，中古後期的下議院絕不是崛起中的中產階級所自有的獨立發言管道。大體而言，下議院被勢力強大的貴族力量所操縱控制。選舉可能有欺詐，代表可能受賄或被威嚇。而雖然國會在十四世紀曾經廢黜兩個英國皇帝——一三二七年的愛德華二世與一三九九年理查二世——這兩個例證只是對貴族之間權力鬥爭結果的認可而已。如此的國會批准似乎是必

要的；但我們切勿就此論斷國會至此已變成一個自由機關；它象徵式地代表英國社會的意志；其實，它對皇室和貴族的力量仍然敏感，往往只是確認一些早已在城堡裏或戰場上作成的決定。

百年戰爭既是刺激國會特權增長的大事，也對英國的財富和人命造成重大損失。一三三七年開始，殘酷的戰爭與長時期的停戰交替著，拖了一百一十六年。廣而言之，這場衝突是諾曼征服英國以來的英國與法國紛爭的持續。自一〇六六年起，英國和法國在許多情況下都發生戰鬥。一二〇四年，卡貝王朝的皇帝從安如帝國奪得法國北部廣闊的土地，但英國皇帝在西南部的格斯肯尼仍然保有其脆弱的領主權。英國宣稱擁有格斯肯尼，又以波多（Bordeaux）的酒和英國衣飾構成活躍的商業活動，於是促成法皇非力普四世和英皇愛德華一世之間一場虛耗而沒有結果的戰爭（1294-1303）。英國和法國爭奪格斯肯尼的管轄權，是一三三七年戰火重燃的原因之一。

百年戰爭的另一個原因是英法在外交上爭奪法蘭德斯的控制權，因為法國需要它來使領土完整，英國需要它來保障利潤深厚的羊毛貿易。一三二八年法國卡貝王朝最後一個皇帝去世，無嗣，皇位繼承引起爭端，兩國的緊張局勢由此升級。英皇愛德華三世（1327-1377在位）宣稱擁有法國皇位之權，因為他的母親是非力普四世的女兒。但是，瓦魯亞的非力普（Philip of Valois）也可以爭名份——他是非力普四世弟弟的兒子。法國貴族不顧史實，主張繼承權不能由女方一脈來，於是擁立瓦魯亞的非力普，是為非力普六世（1328-1350在位）。他成為瓦魯亞家族第一個皇帝，而這家族統治法國至一五八九年。愛德華三世最初還接受這個決定，但到一三三七年，其他原因促使他運用武力，他再度提出他繼承

法國王位的權利，自號為英國兼法國的皇帝。

這些原因都不能算是決定性的原因，而且這場戰爭原來是可以避免的。但愛德華三世與非力普六世都是勇武、高昂的浪漫主義者，喜愛英雄式的武裝衝突。雙方貴族也染上同樣的態度。英國的長弓手在格勒錫（Crécy, 1346）和波登亞（1356）獲得重大勝利，法國士氣大失。英國獲得軍事勝利，英國人就尊崇愛德華三世，但他們廢掉他的繼位者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因為他比較喜歡消滅英國貴族的權力，而不用心作戰。亨利五世（1413-1422在位）重燃戰火，一四一五年在阿金科特（Agincourt），奪得重大勝利，獲得英國子民的稱頌。但是，亨利五世早夭，繼而又出現聖女貞德（Joan of Arc），戰局一轉，不利英國。一四五三年，這長久的傾軋終於結束，英國損失所有在法國的領土——卡來港（Port of Calais）除外。英法幾世紀以來的紛爭糾結至此完竟。聖女貞德的靈見實現了：瓦魯亞王朝的查理七世統治法國。

百年戰爭結束不到兩年，英國進入約克（York）和蘭克斯達（Lancaster）兩個敵對家族之間的內鬥時期。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在一四五五至一四八五年間時斷時續，成為英國中古貴族的最後一次紛爭。貴族與平民都厭倦了無止境的流血殺戮，渴望堅穩的皇室統治。約克郡的愛德華四世（1461-1483在位）在位期間，英國有某種程度的平治。最後的戰役爆發後，都鐸王朝（Tudor）第一個皇帝亨利七世（1485-1509在位）登基，強大的君主政體從此長駐英國。愛德華四世和亨利七世都致力尋求和平、豐盈的國庫和富於效率的政府。到十五世紀末葉，這些目標逐漸接近掌握之中。經濟復甦，許多麻煩的貴族又已在玫瑰戰爭中死去，英國人復十分願意以服從與和平替代無政府狀況。現在需要的只是強

大的皇室領導，而剛強且果決的都鐸王朝也充分提供這種領導。

法國

百年戰爭對英國是一大考驗，對法國是更大的考驗。所有戰鬥都在法國土地上進行，而即使沒有戰事的時候，連羣結隊的傭兵也不斷在法國鄉間掠奪。「好人約翰」(King John the Good, 1350-1364在位)——其實是一個壞透了的國王——既沒有力量應付英國，也沒有能力整理他民氣敗壞兼受瘟疫蹂躪的國家。一三五六年，即法國在格勒錫的軍事慘敗以後十年、黑死瘟疫橫行之後八年，法國又被波疊亞的慘敗弄得不知所措。為數眾多的法國貴族陣亡，而約翰自己也被英國俘虜。

在巴黎布商馬塞爾(Etienne Marcel)領導下，三級會議(Estates General)在巴黎召開，暫時承擔執政工作。一三五七年，他們強迫約翰的兒子，年輕的皇儲查理(Dauphin Charles)，頒佈革命性的憲法章程，稱作「大律令」(Great Ordinance)。這法令體現了中產階級控制的階級大會與君主共同治理法國的要求。自此以後，階級大會要定期集會，並由一小型常設委員會監督皇室的財政、法院及行政。皇儲查理痛恨這種對皇室權威的侵犯，暫時屈服，然後，逃出巴黎，爭取鄉下人支持。

到一三五八年，可怖的瘟疫、經濟衰退、傭兵盜賊已經驅使法國農民走上公然暴亂之途。傑克幫(Jacquerie)——暴亂農民的總稱——缺乏一貫的目標與有效的領導，卻讓法國北部鄉間許多地區度在恐怖中過難忘的兩星期。據說，有一次他們強迫一名貴族的妻子吃掉她被烤熟了的丈夫，之

後，將她姦殺。但是，貴族階級與城市精英不久便平定這次暴亂，其野蠻手法，與暴民如出一轍。一三五八年的傑克幫暴亂引起人們對法律、秩序、及舊有狀況的渴求。這個保守的倒退力量產生了洶湧的保皇主義，使馬塞爾在巴黎的立憲運動失敗。馬塞爾自己在一三五八年仲夏被殺，皇儲查理勝利，返回巴黎。

馬塞爾跨臺，一三五七年的「大律令」變成死文字。以後數世紀裏，階級大會召開的次數越來越疏落。皇儲查理變成了英明的查理五世(1364-1380在位)，建立新稅制，使君主在財政上不必依賴議會，於是，使法國王室成為歐洲最具財富潛力的王室。階級大會沒有像英國國會那樣成為政府整體的一部份。法國國王越來越走向中古高峯時期的措施：通過地方議會來和子民討論事宜。法國也有「議會」——中央與地方法院的派生物——但其功能仍維持於司法方面；它們並不商議批准稅收之事，也不立法。法國國民的凝固力仍繼續比英國落後，因為法國比英國更大、人口更多、文化內容更紛異。到中世紀末葉，法國的大公爵仍舊治理他們的省份，只受巴黎微不足道的干預。沒有了傳聲的國會，法國只有一個聲音為全體法國人民說話——國王的聲音。

查理五世避開正面交鋒，而扭轉戰局。他的軍隊不斷騷擾英軍，一點一點迫使他們撤退。查理駕崩時，法國君主權力已接近復原了。英國只剩下波多和卡來附近幾個細小的前哨基地，之後，罷戰達一個世代之久。

但是，查理五世由無能的查理六世(1380-1422在位)繼承——「瘋子查理」。他由虛弱的幼年，成長為不穩定的成年人，並有定期性的精神錯亂。他在位期間，勃根地與奧爾良兩個家族流血相爭。奧爾良的公爵是瘋子查理的兄弟，勃根地公爵是他的叔父。在卡貝王朝時期，這樣勢力巨大、又

擁有封土的皇室家族成員通常會與皇帝合作，但，如今瘋子在位，勃根地和奧爾良遂爭奪王國的控制權。十五世紀期間，奧爾良派認同瓦魯亞王朝，而勃根地則發展成法國和日耳曼之間的一個獨立邦國；不過，在瘋子查理時代，一切都還不確定。

當法國再一次受謀殺和內鬥折磨時，英王亨利五世重燃百年戰爭的戰火，一四一五年，在阿金科特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這時，勃根地與英國合力，瘋子查理被迫儲立亨利五世為繼承人。但兩個皇帝都在一四二二年駕崩。瘋子查理的兒子查理七世（1422-1461在位）繼續其三心二意的反抗，勃根地和英國卒能瓜分法國北部，並準備消滅瓦魯亞王朝的殘餘力量。

當其勢運陷入最低潮時，仍未加冕的查理七世在急迫中接納農民出身的貞德的軍事協助。貞德在奧爾良得勝，她堅持查理在理姆斯加冕。後來她被擒、一四三一年死於火刑：這一切，都成為傳奇。她燃起的士氣撩起了法國人的希望。在她死後的二十年裏，查理七世的軍隊連戰皆捷。英國的資源本來不足以征服法國，英國在百年戰爭中的成功，大部是法國卑弱的領導層和內部分裂、癱瘓的結果。當戰爭接近完結時，查理七世致力重建皇家政府。這項工作，他得助於可靠的稅收、正規軍隊，以及有效的行政機構的穩定發展。

中央集權在路易十一（1461-1483在位）時代更有進展。路易十一因其相貌與政策而得名「蜘蛛國王」(Spider King)。他是查理七世（他鄙視查理七世）的兒子和繼承人，他結網構陷對手，藉謀殺、砍頭和背信，除掉他們。最後一個勃根地公爵於一四七七年與路易的瑞士盟友戰鬥而陣亡，勃根地的威脅解除了，而蜘蛛國王迅速沒收整個勃根地侯國。他廣結盟友，精於運用離間挑撥，在法國統一和瓦魯亞專制主義

的目標上取得重大進展。

至一五〇〇年，法國君主已以中產階級專業官僚構成中央行政系統，統治法國。貴族極受偏袒而且顯然馴服了。市鎮欣欣向榮，而新的王家軍隊也逐漸把瓦魯亞王權伸向外國。

西班牙

中古晚期的西班牙歷史和英國相似：經過數世代的內部紛亂，至十五世紀末葉，政治凝結、皇權鞏固。中古高峯的「收復伊比利」於一二七〇年告一段落，半島上有三個強大的基督教王國——卡斯提爾、亞拉岡、葡萄牙——以及在南端回教的格蘭那達。其中，卡斯提爾最大，亞拉岡則最都市化、最帝國主義。十三及十四世紀，亞拉岡諸王征服了地中海的島嶼：馬約卡 (Majorca)、米諾卡 (Minorca)、薩丁尼亞、以及西西里等島嶼，亞拉岡的商人也開始發展國際商業。

中古晚期，亞拉岡與卡斯提爾都遭遇內亂之苦。亞拉岡君主對「科提斯」(Cortes, 地方代表議會)作些重要讓步，試圖安撫貴族與市民，但成就有限。一四七二年，亞拉岡的卡特隆尼亞省 (Catalonia) 發生商人叛亂，為時甚久，經過很大困難，才獲壓平。同時，卡斯提爾有貴族起事，又有皇位繼承的爭端，極為多事。一四六九年，亞拉岡的費迪南 (Ferdinand) 娶卡斯提爾的伊莎貝拉 (Isabella) 為妻，和平和強大政府的時代才來臨。一四七四年，伊莎貝拉繼承王位，一四七九年，費迪南也繼承王位。此後，雖然地方代表議會、習慣等持續下來，但是，已有一個有效率中央政府管理著兩國土地，並且終於把兩國合一為西班牙王國。

於一四九二年，這個新王國征服回教徒擁有的格蘭那達，完成「收復」西班牙半島。西班牙君主政體努力不懈，使人民服從、建立一統、實行正統宗教，於是，迫令回教徒及猶太人選擇皈依天主教或放逐。結果，猶太人大舉遷出，使王國失去許多寶貴的商業與學術人才。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成爲國家的工具——既是政治、也是教義統一的工具，遂使皇帝不但得到宗教統一，也增加了收入。當局說服貴族，讓他們相信最有利的作法是支持、而非反對君主，這樣，地方分離主義被控制。一五〇〇年確立一統、又快將有新世界的財富湧入的西班牙王國，逐漸走入豐富的文化表現，而且成爲國際勢力。

西班牙與葡萄牙在十六世紀的富裕，得力於它們處於歐洲西端、面對大西洋的戰略地位。造船術與航海術的長足進步，開啓了長期遠洋航行之途。到一五〇〇年，歐洲的船長已經涉足大西洋與印度洋各地。征服這些海洋，爲西班牙帶來一個新世界的帝國，以及印加人（Inca）與阿茲特克人（Aztecs）的財富。葡萄牙也因此而以海路直達印度，在遠東建立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不過，首先探索大西洋的，是具有地中海商業經驗的義大利海員。十四世紀初，威尼斯已有船隊每年經過直布羅陀海峽，前往英國與法蘭德斯，熱那亞商人則已與加那利羣島（Canary Islands）貿易。至十五世紀中葉，加那利羣島、馬達拉羣島（Madeiras）、亞速爾（Azores）、綠角羣島（Cape Verde Islands）都已落入西班牙或葡萄牙手中，但伊比利半島諸王的船隻仍繼續依賴義大利船長與海員的技術。替西班牙君主發現新大陸的，正是一位熱那亞船長：哥倫布。

傳教熱誠、好奇心、貪婪，是這些探險的複雜動機。後來，贊助其事的君主、辛苦航行以求成功的船長與商人，其

基本動機都是貪慾。不過，極力贊助葡萄牙從事非洲探險的航海家亨利親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在位），其主要動機似乎是希望傳播基督教福音，以及發現未知的土地。從他在沙格斯（Sagres）的王廷，船隻向西開往大西洋各島嶼，向南前往非洲海岸。而在沙格斯，亨利親王搜集大量無比珍貴的地理與航海資料，教給船長。葡萄牙的非洲航行在亨利親王死後仍持續著，而在一四九七到一四九九年達到高潮：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達伽馬此行，獲利百分之六十，十足顯示了這條新的、直接的東方航道的商業潛能；原來的老路棄而不用，鄂圖曼帝國與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在商業上逐漸衰退。未來，是新興的大西洋王國的天下。

日耳曼及義大利

中古晚期的日耳曼和義大利，遭到與英國、法國、及西班牙半島類似的分離開擾，但，這兩地到十五世紀末葉都還沒有類似的中央集權趨勢。日耳曼與義大利進入近代，內部分裂，並且無法與西歐君主國抗衡。中古高峯期的政教鬥爭在日耳曼生出一個積弱、實行選君制度的神聖羅馬帝國，在一三五六年的「金印詔書」（Golden Bull）裏獲得正式認可。在帝王任命與加冕方面，詔書中隻字未提教皇的角色，王位繼承方面，留給七位主要的日耳曼王侯決定。這些「選侯」是：緬因茲（Mainz）、特里爾（Trier）、科隆（Cologne）的大主教，萊茵的伯爵，撒克遜的公爵，布蘭登堡的侯爵，以及波希米亞的國王。這些有選舉權的邦國仍然相當穩定，其他主要的日耳曼諸侯國，如奧地利哈布斯堡公國，也比較穩定，但帝國本身變得衰弱無力。一五〇〇年，

日耳曼有一百多個諸侯國——封邑、教會城邦、自由市、郡、公國，他們的邊界隨戰爭、婚姻、繼承事件而定期改變。在義大利，帝王權威在政治方面和教廷權威在帝王選舉裏一樣微不足道。日耳曼與義大利後來終於脫困，但，由於早先的糾結，後果長期難消，兩者都繼續飽受困擾。

至十五世紀，中古晚期的義大利經過大邦控制小邦的過程，演變成五大政治單位之間的微妙勢力均衡：那不勒斯王國、教廷國，以及北部的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三邦。那不勒斯先由一個法國、後由一個亞拉岡王朝統治。義大利中部仍受教廷控制，但羅馬本身政治混亂、本地貴族又擁地自雄，羅馬的控制甚為無力。米蘭及稍後的佛羅倫斯不再是共和國了，由自我封位的專制君主統治。威尼斯則始終是由一個狹隘的商業寡頭政治集團統治的共和國。

這些專制君主其實並無皇室繼位權或合法承繼權，他們不顧傳統與習慣，純以計謀與實際權力遂行統治；他們常被視為「新的文藝復興人」的象徵，但，其實，他們的機會主義對北方君主並不新鮮，而他們那種無情，征服者威廉或非力普四世也不會驚奇。不過，由於他們地位朝夕不穩，五大義大利勢力的均衡又脆弱，傳統外交手法於是變得相當精練巧妙。善於恭維與刺探的外交使節固定往返，兩個或三個弱邦往往結盟對抗一個強邦，時常變換盟國的結果，產生了一種叫做「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原則。

一四九四年，一批強大法國軍隊入侵義大利半島，半島上的勢力均衡遭受破壞。此後幾個世代，義大利成為法國與西班牙敵對爭衡的戰場，而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外交技巧與觀念也傳過阿爾卑斯山，影響了北部諸國的關係。近代外交不顧道德的限制與教會的調解，一切以精打細算的勢力平衡為基礎，這種趨勢，在整個中古晚期的歐洲發展起來。不

過，這種外交趨勢是在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首先成熟。

東歐

一般來說，在政治凝結統一方面，東歐並不比日耳曼或義大利成功。波蘭、立陶宛、匈牙利和北部的斯堪地納維亞諸邦都飽受貴族動亂與王朝紛爭的痛苦。條頓武士受挫於斯拉夫軍隊與內部叛亂，而巴爾幹半島大部份地區受制於鄂圖曼的土耳其人。只有俄國與鄂圖曼能建立強大的邦國，而在一五〇〇年，兩者都是極度獨裁專制的國家。

波蘭已於一〇〇〇年成為一個天主教王國，但在整個中古高峯期間，它被貴族派系之爭與王位繼承之爭所癱瘓。一三八六年，它與迅速擴張的立陶宛合併，這個波立國成為歐洲最大的政治單元，不過，可能也是管理最差的國家。立陶宛有個武士親王，叫雅支樂 (Jagiello, 1377-1434)。他坐上波蘭王位之日，由異教改依天主教。一四一〇年的坦能堡 (Tannenberg) 一役，波立王國在他領導下擊潰條頓武士。不過，即使在雅支樂領導下，波立王國仍然沒有真正的中央政府；為了對日耳曼人，貴族才與統治者合作——而且是暫時合作。波立王國版圖橫跨黑海到波羅的海，包括很多以前屬於條頓教會與舊基輔俄羅斯的土地，卻缺乏有技巧的行政人才與政治機關來管治這龐大的土地。貴族十分強大，農民則逐漸淪為農奴。它在政治上如此無能，因此在歐洲近代初期，日耳曼與俄羅斯之間不曾興起任何強大國家。

俄羅斯的宗教來自康士坦丁堡，而不是來自西歐，而拜占庭文化在俄羅斯文化發展史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一二三七至一二四二年，蒙古西征，橫渡俄羅斯，一時侵入中歐核心。俄羅斯文化停滯不振。蒙古人雖然很快退離歐洲大部分

地區，卻留在俄羅斯達二百四十年；他們容許地方自治，但堅持徵收貢品。

蒙古統治的幾個世紀，莫斯科公侯不但繼續生存，並且擴張、興盛。莫斯科的基督教「大親王」與蒙古的可汗合作，而且得到東正教的支持，在俄羅斯北部大事擴張影響力。蒙古人任命他們收集貢品，他們有時更幫助蒙古人粉碎其他俄羅斯王侯的叛亂。莫斯科成爲俄羅斯東正教的總部。當突厥人（土耳其人）於一四五三年佔領康士坦丁堡，「第三個羅馬」（莫斯科）乃號稱爲斯拉夫東正教世界的精神主宰。

起初，莫斯科的王侯受蒙古可汗全力支持，地位鞏固。但，到十四世紀末期，莫斯科逐漸領頭反抗蒙古。最後，一四八〇年，莫斯科大公兼俄羅斯沙皇伊凡三世（Ivan III）完全否棄蒙古權威，廢止進貢。

莫斯科王侯反抗蒙古、對信仰羅馬天主教的立陶宛作戰，都得到若干程度的民衆支持，但，他們的獨裁專制，不下於拜占庭皇帝與蒙古可汗。莫斯科權威擴張，諾夫戈拉德等城邦裏初生的共和主義爲其所粉碎。那些大親王的政治靈感來自中亞、而不是來自西方。他們的城邦沒有地方會議、沒有全邦會議，也沒有能發言的中層階級。俄羅斯後來終於擁有強國的物質條件與組織條件，但是，它與歐洲其他部分隔絕好幾世紀，所造成的後果，並非隔夜就能彌補。

鄂圖曼帝國

東歐最大的外來威脅是來自東南方——鄂圖曼土耳其人從小亞細亞入侵巴爾幹。這些阿提拉游牧部族從中亞的家園被蒙古人趕到小亞細亞，首先是當傭兵，然後以征服者的身

份來。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統治小亞細亞大部地區，並與當地人通婚。一三五四年，他們繞過逐漸衰弱的拜占庭帝國，進侵歐洲。十四世紀後半葉，他們吞滅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並擴展其勢力至巴爾幹半島絕大部分。一四四四年，在決定性的瓦爾納（Varna）一役，他們粉碎一支反土耳其的聖戰軍隊，確立了他們在東南歐的地位。既有瓦爾納之大勝，一四五三年攻陷康士坦丁堡，只是一記附筆而已。不過，全歐洲都承認：穆罕默德二世征服這個從未被征服的城市時，就終結了一個時代。

鄂圖曼帝國本身延續到二十世紀。它以土耳其共和國的名字，延續到今天。鄂圖曼的蘇丹們和莫斯科大公們一樣，是獨裁專制者。斯拉夫人在他們的行政系統裏服務，並且與鄂圖曼地主貴族的騎馬武士並肩作戰。這些蘇丹在俯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金角（Golden Horn）上錦衣玉食之際，他們的政府則使東南歐隔絕於西方文明。

第十六章 經濟與文化的轉變

城鎮與商業

西歐從興盛轉向衰落，而這轉變是逐漸、而且因地而異的。早在十三世紀中期，西歐的繁榮就已經開始走下坡。從十四世紀初期，到十五世紀大部分時間，各種相關的趨勢，例如人口減少、市場縮減，為時已久的填土工程終止，以及一種悲觀而衰頹的情緒，都導致整體經濟的衰退，並且加深社會對立。

這些趨勢並不是普遍的，在義大利北部沒有其他地方那麼明顯；阿爾卑斯山以北各地，因為受有利的貿易環境和科技進步的影響，比從前更繁盛。英國很多市鎮漸趨衰落時，卡文特利 (Coventry) 及其他城鎮都隨著羊毛製衣業的興起而富裕起來。中世紀後期，布魯格 (Bruges) 的弗萊明市鎮仍是北方海域一個繁忙的貿易中心。佛羅倫斯有龐大的紡織工業和國際銀行業，後來成為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重鎮。在佛羅倫斯及其他地方，個人或家族的企業從國際貿易和銀行業得到利潤，越來越富有。巴地 (Bardi)、波魯茲 (Peruzzi) 及梅迪奇 (Medici) 是佛羅倫斯銀行業裏的大家族。阿爾巴斯山以北可與他們相比者，有十五世紀法國皇室財政

大臣布耳熱的傑克·古爾 (Jacques Coeur of Bourges)，為神聖羅馬帝國做事的銀行家富格斯 (Fuggers of Augsburg) 等等。不過，在中世紀後期動亂的歲月裏，這些大財政家十分不安全。巴地與波魯茲家族沒落於十四世紀中葉，傑克·古爾則被欠他錢的國王查理七世弄垮。有些生意還不斷發展，但中古後期銀行家的總資產比他們十三世紀時的前輩少得多。

即使是十四世紀中葉黑死瘟疫來臨之前，歐洲的人口似乎就已經沒有增長、或許甚至開始減少。沃壤逐漸缺乏，天氣變得更冷和更多雨，對農業帶來不良的影響，使大家庭衰落，出生率下降。不過，人口遞減和經濟衰退的根本趨勢雖然並非瘟疫引起，卻因瘟疫而大大惡化。瘟疫從東方的貿易路線傳到歐洲，由黑老鼠身上的跳蚤以驚人的速度傳播。精確的死亡人數無法肯定，不過，合理的估計應該約為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眾多的城鎮，死亡率超過百分之五十，偏僻的鄉村所遭受的禍害則較少。結果，受最大打擊的是最進取、最有訓練的歐洲人，城鎮裏很少家族安然無損。

瘟疫還間歇地襲擊劫後餘生者。的確，此後三個世紀，歐洲人一次又一次受到這致命疾病的騷擾。十四世紀的醫學無法解釋瘟疫傳播的過程，而城鎮生活的不合衛生更加速了瘟疫的傳播。有些人逃走了，有些人變成宗教狂，有些人放蕩度日，亦有些人仍忠誠地工作，祈求神佑。有一個西安那的居民這樣描寫：

父親遺棄了子女，妻子遺棄了丈夫，兄弟也遺棄了兄弟。因為這種疾病似乎會通過呼吸和目光而傳染；他們死了，沒有人為了錢或友情而把死者埋葬……。在西安那，很多地方掘起很大很深的坑，往裏面堆滿死屍……。我親手把五個子女埋葬，其他很多人也這樣

做。城裏處處是亂泥遮蓋的屍體，蓋得稀稀薄薄，被狗拖出來吃掉。

在教皇居住的阿維農，人們組織了很大的宗教遊行：

他們不論男女，很多赤足而行；有人穿上麻衣；有些人在身上塗灰；他們邊走邊哀號，又扯頭髮，又用鞭子抽自己，抽得全身血污。

歐洲終於逃過大難；城鎮與鄉村的經濟逐漸復甦，雖然不是完全復元。但人們記憶猶新，而死亡仍是很近的事情。

中世紀後期動亂的鄉村促使更多人流入城鎮。但，很多流民都找不到工作，使鎮內的無業遊民越來越多。特權階級盡量維護自己的陣營，更加深了貧富間的差距。行會嚴守其壟斷事業，世襲制度變成獲得行會領袖地位的主要途徑。為了在衰退中的市場保持利益，行會之間不斷殘酷鬥爭，並且與地方貴族鬥爭、更與城市裏瀕臨絕境的無產階級鬥爭，而後者因為不能向上爬，階級意識遂不斷成長。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過，中世紀後期，很多義大利城市從寡頭共和演變成獨裁專制。例如，佛羅倫斯被黑死瘟疫蹂躪，一三七八年痛遭一場無產階級叛亂，又被多年無結果的戰亂弄得十分窮困，於一四三四年被梅迪奇銀行家族所控制。在一個世紀以前，米蘭被野心勃勃的維斯康提家族所控制，一四五〇年落入斯偉沙 (Sforzas) 這更獨裁的家族王朝之手。一般來說，面對下層階級的壓力，為了保持特殊的經濟地位，富有的商業家族多與巨公大豪或君主分享政治權力，或者，像在義大利，把政治權力讓給獨裁專制的君主。

這個時期，各方面都不穩定，環境又差，逼使商人嘗試開闢新的事業領域，以及提高經營效率。中世紀後期大量的經濟文獻，反映城市與鄉村的精英努力嚴格管理收支會計。日子越來越難過，做生意的程序必然也變得更嚴謹而老練。

地主貴族與農民

西歐鄉村的地主貴族與城鎮裏的上層階級一樣，逃過了中世紀後期的社會與經濟動亂。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大部分抱緊大量土地，而且保住財富。穀價日漸下降，他們回應的方法是將土地出租給農民，又教農民從前的力役改為付銀。其他地主貴族自己留著土地，換成生產更有利潤的奢侈品，如羊毛、肉類、酒類和啤酒（大麥和酒花）。

黑死瘟疫帶來人口顯著的下降，卻解決了人口對土地需求的壓力，給瘟疫後的生還者比前幾世代更好的生活。瘟疫令勞動力短缺——至少，暫時的短缺，結果工資大幅度上升，農民可以用比較從前低的租金租地。有些具備企業精神的農民因地價下跌而獲得利益，積聚土地，僱用工人耕作，而大發利市。

但瘟疫對經濟也有不良影響：造成商業上的混亂和破壞；瘟疫又令價格激烈波動，減少消費人數，尤其是城鎮裏的消費者。中世紀高峯時期，城鎮的人曾經是農產品拓展市場的對象。在某些地方，由於勞工短缺，領主給農奴以自由身，誘使他們不到其他地方找更好的工作。但是，日耳曼和部分法國的領主卻比從前加重農奴的勞役。

瘟疫之後幾十年，工資不斷上升，特權階級試圖用人為手段，或通過集團的陰謀、或以立法，壓低工資。例如在英國，一三五一年及其後的「勞工法令」(Statutes of Laborers)，目的就是在凍結黑死病以後的工資。這種作法並不成功，卻使農民感到很痛苦，促成了一三八一年英國的農民叛亂 (Peasants' Revolt)。這次混亂而血腥的叛亂，僅是歐洲中古後期多次恐怖叛亂之一。正如法國的傑克叛亂，以及此

期很多相似的農民叛亂，我們都可以看到：社會各階層為了爭奪衰減中的財富而殘酷鬥爭。

東歐農民的生活較西歐農民的生活更苦，因為中古後期的東歐貴族都把農民變成農奴。在東西歐都一樣，有土地的貴族小心地監守自己的特權，以防被農民及君主奪去。歐洲有一段時期，中古高峯皇權政府增強的趨勢一度逆轉。除了俄羅斯之外，東方的君主都未能真正對抗大地主，但，到了十五世紀後期，西歐的君主開始能遏止貴族的獨立。在英格蘭，新的都鐸王朝有促進商人利益的傾向，但在西班牙與法國，貴族由於政治上順從君主，而在經濟上獲得優待，並在王室的行政機構、軍隊與教會裏獲得特權地位。

於是，西歐貴族由軍閥變為穿上絲綢的朝臣。騎馬武士的傳統封建角色已成過去，因為君主現在以傭兵組成軍隊，而步兵也在大部分的戰役裏取得勝利。此外，火藥越來越普遍使用，很容易擊毀武士的盔甲和城堡。不過，封建從歐洲軍隊消失的時候，他們在藝術、文學和宮廷儀禮方面則越來越突出：十五世紀充滿耀眼的盔甲、童話裏的城堡、勳章、以及堂皇而奢侈的比武。武士精神不能表現於戰場，於是表現於幻想中。在無情的政治犬儒主義盛行的時代，騎士的浪漫道德倫理卻充分綻放。在這美麗幻想的背後，地主貴族在社會秩序裏高據其特權地位。

經濟復甦

西歐在十五世紀後期，皇權鞏固，同時，經濟經過長期衰退後，又普遍復甦。十六世紀歐洲人口大概比十四世紀少，但這時人口再次上升。商業加速復甦，市鎮不斷成長。技術不斷改進，現在，工廠用水推動，增加了羊毛的產量，

而水推動的幫浦則用來抽掉礦坑裏的水。由於採礦技術進步，歐洲可以供應更多的銀，和發展中的工業所需的各種金屬，如鐵、銅、鋁、錫。炮車和活版印刷的製造不但要靠創新的觀念，也要靠許多世代以來冶金技術的進步。造船與航行技術的進步，促成日後大西洋的海上探險，不久便給西歐帶來滾滾財富。到一五〇〇年，漫長的經濟危機已成過去。歐洲進入了經濟增長和世界擴張的時代，並且在這方面遠遠超越早先中世紀高峯期的成就。

成長與衰敗

中世紀後期最輝煌的兩種科技革新是印刷和火藥。最先發展的是火藥。到十五世紀，在百年戰爭、土耳其的擴張戰爭和歐洲大多數軍事行動裏，火藥都起過相當作用。活版印刷在十五世紀中葉以後才發展，雖然對歐洲文化的影響很深遠，但它的全面衝擊在一五〇〇年以後才顯現出來。即使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新人」，也認為印刷的書籍是手寫原稿的庸俗模仿。這件事實提醒我們不要以為中古後期的歐洲——甚至文藝復興時的義大利——完全是新事物的開始；當然，在此期間很多有創見的歐洲人都有強烈的新鮮和「現代」氣息，但中古的方式、風格和思想習慣也有繼續不斷者。看著消退中的中古理想與建制，當時的人往往有失落感，相信文明在走下坡。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者伊尼阿斯·西爾維斯（Aeneas Sylvius）——後來的教皇庇佑二世（Pius II，死於1464）——從土耳其人的威脅和基督教國家之間的鬥爭，作成結論說：前途一片灰暗。一五〇〇年以後生活的一代，因海外的探險、政治的鞏固和經濟的繁榮，對前途可以滿懷希望，不過，一三〇〇和一五〇〇年間，歐洲被陰影籠罩著。

陰影之下，是一種焦躁不安、一股激烈的情緒主義，使中古後期的藝術作品帶有一種戲劇性的緊張。充滿危機和衰退的新時代裏，十三世紀那種平衡靜穆的理想已不合時宜。這新時代裏，自我鞭打的做法十分流行，死亡之舞成為藝術家最喜愛的題材。在一個經濟衰退的時期，瘟疫流行、暴力常見的時代裏，中古高峯文明的信心與秩序都無法延續。

崩解的情況在很多方面都顯現出來——階級間的衝突日漸激烈，整體一貫的建築轉而為輕綺裝飾的建築，武士功能與騎士幻想分開，基督大同世界演變成為區域國家，聖多瑪斯·阿奎納斯所融合的理性和信仰也分離。阿奎納斯使物質與精神、肉體與靈魂、邏輯與天啓具有層次秩序，彼此調和，成就了中世紀理性宇宙秩序的高潮。十四世紀哲學家攻擊他的體系，可以明見，他們已經拋棄這種秩序的探索。

中古晚期的思想

聖多瑪斯的〔神學大全〕就像哥德式建築的大殿，以一個全能、仁愛且理性的神為基礎，把宗教熱誠與邏輯秩序統合起來。十四世紀根據兩個相關命題，攻擊這種統合：(一)把理性加在神的屬性裏，是以人類有限的邏輯規律把神的無限權力加以限制；因此，聖多瑪斯所說的理性上帝被換成意志上帝，中古高峯時以邏輯秩序對待神的看法也就從此蝕壞；(二)因此，人類的理性根本不能描述神，邏輯與基督教信仰是兩個分隔而封閉的世界。

牛津的聖方濟修士當斯·史高特斯（死於一三〇八年）首先採用神是意志的和不能理解的觀念，對聖多瑪斯的知識論作詳盡的批評。當斯·史高特斯並不反對理性可能解說天啓真理，但他使用邏輯，比阿奎納斯小心。聖多瑪斯被稱為

「天使博士」，史高特斯則被稱為「精細博士」。由於他的思想極端複雜，以後，誰要不嫌麻煩，跟隨他的論點，就叫做「當斯」(dunce，譯按：傻瓜之意)。這樣的稱謂是不公平的，因為當斯·史高特斯在後期經院哲學的發展上是個重要且富創見的人物。不過，你還是會忍不住，把他那錯綜複雜的思想體系跟後期哥德教堂的華麗多飾並列在一起。他是徹底的基督教理性主義者，卻第一個破壞聖多瑪斯的統合，並把理性抽離神學領域。

另一個牛津的聖方濟修士，奧坎的威廉(死於一三四九年)則從各方面批評聖多瑪斯的綜合哲學。奧坎的威廉辯稱，上帝和基督教的義理完全不能驗證，只能用信仰去接受，人類的理性必須限用於能夠觀察的現象。在一位深不可測的創造者主宰的不可預測的這個世界裏，人只能就自己能直接目睹或體驗的事物加以推理。奧坎的威廉激進的經驗論否定一切形上探求，也否定理性的論證能從紛異的可見事物推演出事物背後的統一。由理性與信仰這種大分家，結果造成中古晚期思想的兩個特徵：以科學控制物質事實、邏輯不能運用於以虔誠為主的神秘主義。在奧坎的威廉及其眾多追隨者的思想裏，我們發現神秘主義與經驗主義並駕而行：因為這兩個領域既然永遠不接觸，也就永遠不會有矛盾；有智慧的基督徒可以二者得兼。

奧坎的威廉的哲學同時可作中古晚期神秘主義和中古晚期科學的基礎。事實上，有些神秘主義者把自己看成經驗主義者：因為經驗主義者只接受他所經驗之事，而神秘主義者也不再努力去瞭解神，只盡力去「經驗」他。另一方面，科學擺脫了神學束縛，得以自行發展。十四世紀，巴黎大學教師尼古拉·奧雷斯米(Nicholas Oresme)攻擊亞里士多德的運動理論。他提出地球旋轉之說，用以解釋太陽和星星每

天走過天空的運動。奧雷斯米的理論受益於柯羅塞泰斯特等十三世紀科學家之處，可能多過他所受於奧坎的威廉的啟發，不過，關於神造的宇宙的物理結構，他願意修正傳統的解釋。他願意修正，正是這個年代的特徵：科學上的探求已與天啓真理分家了。

中古晚期很多哲學家都拒絕接受奧坎的威廉的批評，仍然追隨多瑪斯主義。但是，因為阿奎納斯的著作已很周備，繼承者只能作些細節申論，或從事小小的修改。後期的多瑪斯主義變得沉悶乏味，奧坎的威廉對哲學追尋的範圍又加上嚴厲界限，面對這二者，歐洲很多善於思考的人完全就摒棄哲學，轉往更富刺激的科學、數學和古典學術。巴黎大學校長兼哲學家約翰·格生(John Gerson，死於1429)在演講裏批評說：「信仰之事，好奇心沒有用」。有此一語，信仰與理性的結合已完全崩潰。

十五世紀，柏拉圖主義與新柏拉圖主義在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及其以北地區復興。義大利文藝復興兩個傑出哲學家馬西里奧·非西諾(Marsilio Ficino，死於1499)與皮柯(Pico della Mirandola，死於1494)，都是柏拉圖主義者。二人都引用中古高峯期西方所不知的大量柏拉圖著作，但二人都不是西洋思想史上的一流人物。二人都不及中古高峯最傑出的哲學家聰敏，也沒有他們阿爾卑斯山北部同代人古沙的尼古拉(死於1466)那種深度。

古沙的尼古拉在充滿神秘主義的「共同生活兄弟會」裏受教育。他起初是調和主義者，後來是熱心的教皇主義者。在若干程度上，他贊同奧坎的威廉的意見，認為人類的理性有限，只能用在宇宙物理界的單獨現象上，但他堅持，物質界裏的矛盾和多樣性，在一個不可知的神裏是協調和統一的。古沙的尼古拉認為神超越理性的瞭解——只能用他所謂

「學至於無學」(learned ignorance) 的神秘歷程去接近。他像阿奎納斯，相信宇宙背後有秩序，但又像奧坎的威廉，否認人類理性能掌握那秩序。不過，他對這個不可知的神之概念，源自比奧坎主義更遠的傳統；那個傳統植根於異教徒普洛泰納斯及其基督教徒追隨者的新柏拉圖主義，在整個中世紀裏，是一股持續不輟的暗潮。古沙的尼古拉像早先的新柏拉圖主義者，認為宇宙是無限的神不斷創造開啓的傑作。但，他也比他的新柏拉圖主義前輩更進一步，推論說，一個來自無限力量的神的宇宙，並非時間、空間等人類概念所能限制。簡單而言，神所創造的宇宙在潛能上是無限的。又，因為一個無限的宇宙是一個沒有物理中心的宇宙，所以古沙的尼古拉結論說，地球與太陽在這宇宙裏都不佔有任何特定位置；地球既不是中心，也不是靜止，因為在一無限宇宙裏，位置與運動完全是相對的。神是中心、基督是中心，但，是形上意義裏的中心，而不具物理位置的意義。

古沙的尼古拉強調神秘主義、強調人類理性的極限，與當代的風氣相合。他關於有秩序宇宙的綜合看法，也呼應十三世紀的思想。他大膽設想一個無限宇宙，則預示了現代哲學和天文學。

藝術與文學

中古高峯的秩序變成中古晚期的紛歧，在藝術領域明顯可見。哥德式建築最興盛時期，講究高聳仰望與和諧比例——即水平與垂直——的平衡。到了十三世紀後期的大教堂，則越來越強調高聳直立。從前的哥德教堂，精巧的柱頭與裝飾的垂直線，平衡了飛簷和尖頂，造成一種天地間的緊張平衡感覺。但在中世紀晚期，柱頭不見了，直線變得斷斷續續，

由地到頂的高聳趨勢沒有緩衝之處。中古晚期的教堂是流動而不妥協地向上矗立的，有天堂感召的意味，接近神秘主義。

到了大約十三世紀中期，哥德式建築的基本結構潛力已經發揮殆盡。窗戶盡量大，頂越來越高，只要不倒便可，而架空的橫樑也用最高技術建成。哥德式建築的基本構思是以石柱作架構，牆壁則是顏色的玻璃。無比高貴和美麗的教堂已經體現這個基本觀念了。在中世紀晚期，品味改變，建築物的外型也改變；但是，由於哥德建築的風格在結構上已經完成演變，十六世紀以後的哥德建築師又專心於此，因此，他們沒有多大原創性。所以，哥德式後期的建築物，其改革點，主要包括更新和更講究的裝飾，結果，中古晚期很多教堂，若用近代的眼光來看，成為過份講究裝飾的雕刻森林。

這時期建築的兩個特色是毫無拘束的高聳直立和毫無拘束的華麗裝飾，而這兩面都反映建築不再講求理性的統一與平衡。十四與十五世紀的教堂猶如奧坎的宇宙，是由不同元素滙合而成的迷人雜集。於是，富麗活潑的哥德式建築在中古晚期的法國流行起來；同時，十四世紀的英國，講求裝飾的哥德式教堂，到了十五、十六世紀，由垂直的哥德建築物取代，使用花飾的扇狀頂，加上繁富的雕刻，以及一洩無阻的垂直線條。十六世紀，哥德式建築的裝飾和結構都發展到極限，在北歐各地，被古典希臘羅馬的形式取代——十五世紀，這種形式在義大利復興並發展，隨著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發展而流向北方。

中世紀晚期，正如建築和思想，雕刻和繪畫都變得多彩多姿。十三世紀雕刻的靜穆、理想化人文主義換成高漲的情緒主義和個人特質。在弗來明學派影響下，阿爾卑斯山以北的繪畫藝術到達巔峯。畫家如真凡艾克(Jan van Eyck, 死於1440) 首先採用油彩，長於描畫自然景物，精細有如攝

影。批評家認為，這種風格，重視細節，反成整體統一之累。不過，在奧坎眼中的世界，重細節而輕統一，是預料中的事。在義大利，繪畫和雕刻又一次發展新的風格，這種風格建基於古老的教條：自然主義從屬於統一觀念之下。正如文藝復興的建築，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繪畫風格在十六世紀也流進北方，帶給阿爾卑斯山一帶的藝術家一種新眼光。

中古高峯時期的表現形式，其衰落在中古晚期的浪漫傳奇中明顯可見。傳奇曾經是充滿活力的文學形式，現在變得濫情化、形式化，而且靈感枯乏。歐洲中古晚期大多數大眾文學都無可救藥；作家只好離開已經爛熟的騎士故事，轉向細膩的寫實主義，才能再起活力。喬叟(Geoffrey Chaucer, 死於1400)在其〔肯特伯里故事〕(*Canterbury Tales*)裏結合了罕有的心理洞視與高明的描述技巧——其描述技巧之精，足以比美弗來明畫家或後期哥德式的石刻匠。喬叟描述一個肯特伯里的朝聖者——一個腐化的托鉢僧：

他所到之處，
都與鄉下人以及
財產多多的城市女人相親相愛。
因為他有，或者，他說他有資格聽人懺悔，
他所說的一切都超越一般教士；
他有教皇頒發的特許牌照。
他甜甜地聽懺悔的人求他赦免罪，
他欣然赦免他們：為了禮物。

法蘭西·維朗(Francois Villon, 死於1463)——一個巴黎流浪漢，其詩表現出一種痛苦的、有時殘酷無情的現實精神，捕捉了中古後期不安、煩惱的情緒：

死亡使人發抖、臉色發白，
捏他的鼻、使他的血管爆裂，

使他的喉嚨發腫，使他四肢麻木，
使他的筋和神經變硬、抽搐。

對於在充滿尖銳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寫作的維朗，死亡是偉大的民主人士：

我很清楚：不論貧富，
不論賢愚、普通人或圍有頭巾的苦行僧、
奢侈的領主或吝嗇的莊稼漢，
小人物、大人物、雅士、俗子、
穿花戴飾，顰眉、微笑的淑女，
不論出身、
戴帽或披著頭巾，都被那四出搜捕
的死亡捉到。

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古典主義

北方的情調和風氣與義大利文藝復興不斷成長而充滿自信的古典主義形成尖銳對比。在義大利，中古晚期的經濟衰退沒有那麼嚴重、也沒有那麼長；義大利商人繼續支配地中海的貿易，並把經濟活動推展到黑海。雖然城鎮間日漸普遍的戰爭使義大利的狀況與北方一樣不穩定，但義大利北部各獨立公社的公民精神，卻鼓勵創新與新的表達方式。義大利不曾盡力發展哥德式建築，最具中古高峯期文化特色的是法國，而不是義大利。十三世紀大部分時間裏，英、法享受到相當程度的安定，義大利則被政、教戰爭所蹂躪。因此，簡而言之，義大利不會那麼懷戀中古高峯時期的過去，而文藝復興的來臨，與其說是歐洲歷史進入一個新時代，不如說是義大利文化再度凌越法國文化。當文藝復興的觀念在阿爾卑斯山北邊的歐洲產生重要影響時，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已經在

急劇衰退中了。

法國軍事和文化如日方中的十三世紀，義大利人只能回憶羅馬統治世界那段日子。義大利各地都是羅馬留下來的石碑和雕塑。十四、十五世紀，義大利人放棄哥德式建築的風格與巴黎神學家的思想習慣，轉往本身的古典傳統，尋求靈感。雕刻方面，石雕聖徒像的高貴安詳，被強調人體的古典重點取代。中世紀高峯時的聖母像是年輕而纖瘦的，現在變得豐腴奔放。建築師放棄哥德式的螺旋形和尖頂，建造有圓頂和優美古典正面的建築物。學者放棄亞里斯多德和聖多瑪斯的邏輯，轉而尋求希臘羅馬美麗文辭的樂趣。至於畫家，由於缺乏實際的古典模範來學習，便在線條和空間透視上創新，在他們逼真的人物和風景畫上加入了古典的統一。

義大利文藝復興在抗拒中世紀的同時，也保留了很多中古的特色。一四九二年，波吉亞當教皇而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時，文藝復興高峯上的佛羅倫斯正在嚴厲的基督教復興主義者薩伏納羅拉（Savonarola）影響之下。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從來就是一個精英現象，只流行於城市貴族和藝術家之間，義大利人民大眾一點都沒有改變。雖然如此，文藝復興的風格仍然代表了中世紀形式和假設的一大變遷。聖多瑪斯及其同代人都研習希臘的哲學家，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卻用新的角度去透視回顧古典文化。他們看見的並不是大堆可以使用的觀念，而是一整個值得尊重和復興的文化。近代歐洲早期的新藝術和新古典學術基礎，就是這種眼光。

近代歐洲的創生

過去的史學家可能過分強調了文藝復興對近代文明發展的影響。文藝復興對藝術和古典研究貢獻良多；文藝復興期

的學者給歷史學和解剖學帶來知識上的精確性——正如他們的中古前輩使神學和法律具有精確性。文藝復興在外交技巧的演進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但對憲法發展的貢獻很少。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基本上是人文學的學者，他們對科學的興趣，並不高於今天的英國文學或拉丁文教授。現代科學是從中古的大學發展出來的，現代的立法議會——縱使它們在圓頂建築物裏開會——也都是中古代議集會的產物。

一五〇〇年的歐洲，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觀念開始越過阿爾卑斯山。但是，未來並不完全單獨仰賴文藝復興。在歐洲各地，商業再次興盛、人口再度增長，新穎而非文藝復興的發明——火藥、三桅帆船、水動幫浦、印刷機——正在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教廷衰退成一個地方公國，英、法、西班牙等國已奠立穩定的中央政府，而且正走向民族國家之路。歐洲的船隻航抵美洲和印度，從東方直航而來的第一批貨物已到達葡萄牙。很明顯，中古後期的危機和衰退時代已告終結，整個世界豁然大開。